

**“Peasant Women Need R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Needs Peasant Women”:  
Women-Focused Soci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Taihang Base Area (1938-1949)**

Can Shi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3092413574@qq.com

**ORCID ID: 0009-0007-2375-5931**

**“农妇需要革命，革命也需要农妇”：太行根据地妇女调查研究（1938-1949）**

史灿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Received 5 February 2025 | Accepted 13 May 2024*

**Abstract:** Social investigation was a principal instrument by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inked policy with praxis, and studies of women formed a vital part of this endeavour. During the nationwid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CPC persistently advanced women’s investigations in the Taihang base area to mobilize rural women for the revolution, but encountered a severe reversal in the 1943 Ligua-dao uprising in Licheng County, where every member of the Taihang Regional Party Committee’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fice was killed. The resulting shortage of investigators hamstrung the work and demanded urgent remedy. As a stop-gap, after the Taihang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tellectuals active in cultural production emerged as a new investigative force. Focusing on female emancipation, they ventured into the countryside to conduct surveys, thereby transforming the earlier model that had relied solely on party-state organs. Through a substantial corpu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rooted in women’s everyday lives yet suffused with revolutionary ideals, the CPC disseminated policy to women and successfully mobilized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As the revolution deepened, women-focused social investigations became a fresh instru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for the CPC, continually providing powerful support for its work among women.

**Keywords:** women-focused social investigations; Taihang Base Area; policy and praxis; mass lin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摘要：**社会调查是中国共产党联系政策与实践的重要方式，妇女调查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太行根据地持续推进妇女调查工作，以期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与革命，但在黎城离卦道暴乱事件中遭遇了严重挫折。加之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全员遇难，因调查不足导致的工作困顿亟待解决。作为过渡，太行文艺座谈会后，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成为妇女调查的新力量。他们以妇女解放为主题深入乡村进行调查，改变了以往仅依赖党政组织进行调查的单一模式。通过大量基于妇女日常生活且反映革命理念的文艺作品，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向妇女宣传政策、动员其参加革命的目的。伴随着革命进程的不断深入，妇女调查成为中共社会改造的新帮手，持续为妇女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关键词：**妇女调查 太行根据地 政策与实践 群众路线 调查研究

中国革命不仅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也是动员范围与力度不断拓展的革命。<sup>1</sup>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社会调查工作不仅在地域空间上实现了渐次拓展，在性别领域也持续推进。既往研究主要从文本出发讨论中共社会调查的概念变迁和发展过程，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调查活动的性别面向。<sup>2</sup>还有一些学者将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视作求得“事实”的知识工具和民族志式的科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尝试重建妇女调查的历史事实。<sup>3</sup>如果从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来看，同样作为调查场域的广大农村根据地并未得到相应的关注，中共妇女调查的具体运作和发展过程也鲜少得到梳理。

中国共产党自苏区时期便开始进行妇女调查，以搜集到的妇女生活材料作为其制定政策的参考。<sup>4</sup>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后，毛泽东注意到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农妇需要革命，革命也需要农妇”的口号，成为苏区时期中共制定妇女政策的指导思想。<sup>5</sup>转至陕北后，鉴于党内存在“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倾向”，中共中央于1943年2月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四三决议”），正式提出以社会调查配合妇女工作。<sup>6</sup>陕甘宁边区随即组织妇女团专门进行妇女调查，<sup>7</sup>调查内容涉及司法改革、妇女政策与治理技术等多个层面。<sup>8</sup>

为扎根农村，太行根据地甫一建立，相关部门即自主开展妇女调查，以掌握其生存状态、婚姻状况及思想观念。在此过程中，妇女调查成为中共搜集基层材料、研究妇女问题和完备政策的重要支持，并配合革命政策持续助力社会改造。

## 一、进入地方：中共妇女调查的展开

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展围绕城乡妇女的实地调查，女性调查者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性主导色彩，但调查者与被调查的基层劳动女性间常有隔阂。<sup>9</sup>其组织性、动员力以及调查广度尚无法与现代政党组织的妇女调查相提并

---

<sup>1</sup> 王奇生（2013）：《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载王奇生编（2013）：《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

<sup>2</sup> 参见马维强、行龙（2009）：《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太行根据地社会调查刍论》。《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第93-99页；许江、王建华（2023）：《概念形塑：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75-87页；蒋建农等（2022）：《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之成功秘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sup>3</sup> See Tong Lam (2011)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参见连玲玲（2019）：《走过五四：反传统风潮下的知识妇女与妇女知识》。《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3期，第1-7页；连玲玲（2019）：《关于妇女的“事实”：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性别分析》。《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4期，第69-128页。

<sup>4</sup> 毛泽东于1931年初对兴国县进行调查，特别关注婚姻问题与中共的妇女政策实施状况。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5</sup> 张文灿（2013）：《解放的限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第99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sup>6</sup> 《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1943年2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第1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sup>7</sup>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2001）：《陕西省志·第62卷·妇女志（3）》，第27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sup>8</sup> 参见程文侠、李慧（2019）：《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社会》第3期，第210-240页；[美]丛小平（2022）：《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1940-196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燕（2023）：《“妇女顶大事”：大生产运动中妇女“劳动”的组织技术》。《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第1-15页。

<sup>9</sup> 连玲玲（2019）：《关于妇女的“事实”：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性别分析》。《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4期，第121页。

论。<sup>1</sup>

1926年三八节前夕，为及时掌握各地妇女团体概况，中共中央妇女部要求“调查当地一切妇女团体，及女学校、基督教等反动团体也要调查清楚”<sup>2</sup>。借此机会，各地妇女团体开始进行大规模宣传与调查，以“团结及援助挣脱家庭束缚的女子”<sup>3</sup>。为妥善部署妇女工作，中共特别设立专门的妇女调查机构，以期获悉妇女的实际生活状况，及时调整政策。<sup>4</sup>1932年，苏区设立改良妇女委员会，以便经常调查下层妇女的生活状况与广大妇女的要求，并设法改良妇女生活。<sup>5</sup>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更加注重发动妇女支持革命。<sup>6</sup>1938年5月，一二九师政治部提出调查是一切实际工作的出发点，应将调查工作作为向导，其有关“社会风俗习惯”的调查大纲中即包括妇女问题。<sup>7</sup>同年6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决定设立并扩大各级妇女工作委员会，在动员和组织妇女的基础上联合农救会及其他群众团体，调查与救助被难妇孺。<sup>8</sup>8月，晋冀特委<sup>9</sup>宣传部就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给和顺、榆次与赞皇县委发去通知，要求切实报告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建立情况。<sup>10</sup>10月，一二九师总部举行应对日军扫荡的讨论会，提出“要大胆的进行组织，深入农妇中去，注意接近群众的服装、方式、技术”，从阶级观点出发，“进行调查统计工作，帮助统战工作的处理及持久战需要”<sup>11</sup>。该阶段，中共虽然已着手组织妇女工作委员会等机构，但妇女调查工作仍较粗糙，组织、方法和制度未成体系。

1940年至1941年初，晋冀豫区党委临时组织各级党委负责人进行系统性调查。<sup>12</sup>1941年1月，经多次调查反馈，晋冀豫区党委发现根据地妇女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作风严重，影响了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

*不了解妇女在家庭中的实际情况，而强迫妇女集体开荒，不了解妇女的*

<sup>1</sup> 参见王笛（2018）：《社会学与20世纪40年代的秘密社会调查——以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为例》。《史学月刊》第9期，第79-100页；马美茵（2023）：《妇女问题的事实与现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女学生的调查与服务研究（1925—1941）》。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王均霞（2025）：《“社会学的民俗学”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燕京大学社会系的乡村妇女研究》。《民俗研究》第2期，第27-41页。

<sup>2</sup> 《中共中央妇女部通告第六号——关于纪念“三八”节的工作》（1926年2月2日），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1986）：《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3</sup> 柯惠铃（2004）：《性别与政治：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20）》，第257页。“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sup>4</sup> 《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妇女工作计划》（1930年11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年-1949年）》，第702、70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sup>5</sup> 《通知第三号——关于规定妇女各种组织的职权和关系》（1932年5月27日），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史研究室编（199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6</sup> 《妇女工作大纲》（1937年9月），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199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1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sup>7</sup> 《社会调查大纲》（1938年5月），左权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3.1.1。

<sup>8</sup> 《妇女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1938年6月9日），载山西省档案馆编（1989）：《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第23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9</sup>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便于省委领导，采取大特委制度，把全区作了新的划分……辽县以北加上武乡划一特委，叫做晋冀特委。”参见《中共冀豫晋省委给北方局并中央的总报告》（1938年6月22日），载山西省档案馆编（1989）：《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第24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10</sup> 《晋冀特委、晋冀特委宣传部关于报送青年、妇女工作报告给和顺、榆次、赞皇县委及宣传部的通知》，（1938年8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1-66-13。

<sup>11</sup> 《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及地方党主要干部参加的动员一切武装迎击日军华北扫荡的会议记录草稿摘要》（1938年10月19-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1-34-1。

<sup>12</sup>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1987）：《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第15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生活习惯，而去强迫剪发；不去深刻了解妇女的心理变化，及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主观的、轻率的要求妇女离婚，不了解妇女与家庭经济的关系，而对虐待妻子的丈夫，给以过重的惩罚；不了解游击区的环境，而使妇女站岗放哨，致遭受敌人的摧残。<sup>1</sup>

2月，晋冀豫区党委决定从妇女群体的特殊问题与具体要求着手，以便制定政策。<sup>2</sup>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即“八一决定”），决定自中央至地方均设置调查研究机关。<sup>3</sup>党内自上而下的社会调查正式全面展开。

1941年11月，根据北方局“加强调查研究与深入工作”的指示，晋冀豫区党委决定设立专门的调查室并直属于地委领导。此后，调查机构开始向下延伸至县、区乃至村支部。依靠较为系统的调查机构，晋冀豫区党委对黎城、太谷、榆社、和顺、左权等六个县十一个村进行了材料收集和研究，发现农村性混乱严重，先前颁布的妇女政策效力并不显著。<sup>4</sup>调查还发现村支部一般不注重发展女党员，潞城县南花站村在1939年共有党员16个，其中妇女仅有3个。<sup>5</sup>

1942年初，晋冀豫区党委尝试将“婚姻问题与妇女生活”等内容纳入调查大纲，<sup>6</sup>但此时的调查工作仍有不少疏漏。在总结调查工作时，晋冀豫区党委即指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精神尚未根本确立，……，对无知‘安之若素’的现象也仍然存在着。……在目前，由于我们搜集到的材料还非常贫乏不全面，而调查的习惯尚未养成。”<sup>7</sup>

除调查经验不足且组织尚未完备外，传统伦理观建构的性别秩序对女性的身体活动乃至思想认识的限制，既阻碍中共进入乡村进行调查，亦与动员妇女的革命要求相悖。

中共军政力量进入前，“太行山人的行为准则几乎来自三纲五常，人们安分守己，听天由命”<sup>8</sup>，这在妇女群体中尤显突出。据调查，和顺县“鼎革以还，念有余年，虽尽力提倡，自由平等，男女平权，而在我县，仍未实行，还是守着旧礼教，与重男轻女之观念”，该县“男尊女卑，可说未脱，轻女重男，尚未打破”<sup>9</sup>。根据地时期，太行山区社会经济困难，传统陋习依然顽固，早婚、买卖婚、童养媳、包办婚姻、家庭虐待等现象尤为突出。<sup>10</sup>据和顺县虹梯关村的调查显示，该村“买卖婚姻很严重，还有个别童养媳”，“民性强干，光杆多，妇女少，妇女多卖了”<sup>11</sup>。邢台县的妇女“不能出三门四户，死在锅前，烂在锅后”，即

<sup>1</sup> 《展开妇女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工作》（1942年1月20日），载《新华日报（华北版）》第4版。

<sup>2</sup> 《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1941年2月），载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1989）：《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第40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3</sup>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毛泽东文集》，第360-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4</sup> 齐武（1957）：《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第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5</sup> 《潞城县辛安村支部调查材料》（时间不详），长治市潞城区档案馆，A1-1-1153。

<sup>6</sup> 《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各地执行北局开展调查研究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A1-1-71-3。

<sup>7</sup> 《晋冀豫区党委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指示》（1942年3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A1-1-71-1。

<sup>8</sup> 魏宏运编（200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第5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9</sup> 《山西和顺县妇女生活概况调查》，载晋绥社会经济调查统计社编（1935年12月）：《晋绥社会经济调查统计社年刊》，第81、82页。

<sup>10</sup> 《太行区的婚姻制度》（1942年8月2日），载《新华日报（华北版）》第4版。

<sup>11</sup> 《虹梯关村的环境了解》（时间不详），山西省档案馆，A191-1-34-5。

便八路军到村宣传，妇女也因害怕“共产共妻”而难以被发动。<sup>1</sup>

中共曾尝试在晋东南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开展妇女工作，主要包括“筛锣开会，不到罚款，以及抄花名册子，按户登记等办法”，导致党群关系紧张。总结经验、研究问题后，康克清提出应了解农村妇女的生活习惯与特性，要学会适合她们的习惯，“不要让她们觉得你奇怪而不敢接近。接近和组织农村妇女，可以先从感情入手，利用地方习惯，先组织姐妹会、妈妈团等，再逐渐扩充为妇救会”<sup>2</sup>。具体来说：

*可从妇救干部会或其他有关妇女问题的实际上搜集材料；首先调查几个村子及某些典型的妇女；开调查会，作个人或家庭的提问；调查时必须关心、细心、虚心，尽量求得到准确的数字；调查后加以分析研究，使庞杂的材料系统化，以求得正确的结论。<sup>3</sup>*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北方局妇女委员会更重视将妇女调查与妇女工作结合，直接指派几位女同志到武乡县东、西堡村蹲点做农村阶级关系和妇女情况调查。正是在广泛接触各阶层妇女的基础上，妇女调查员掌握并整理了一手材料。以此为基础，中共北方局妇女委员会对根据地农村妇女的实际生活状况有了初步了解。<sup>4</sup>在深入农村了解具体情况后，各级妇救会干部纷纷撰写发表反映战争动员和妇女婚姻问题的调查文章。如晋冀豫区妇救总会副主席陈光在《华北妇女》旬刊第4期发表《战时妇女转移问题》，区妇救总会宣传部部长梁虹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太行区的婚姻制度》，晋中妇救分会副主席翟一在《华北妇女》旬刊第2期发表《家庭会议》等，对指导妇女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sup>5</sup>

匡亚明指出：“如果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了解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具体情况，就不能正确决定政策，进行有效工作。”<sup>6</sup>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若要有效动员妇女，应了解及时掌握各阶层妇女的思想状态及实际生存状况，如此才能有的放矢。但战时背景下，妇女群体受到多方势力的影响和争夺，黎城县离卦道事件就暴露出中共妇女调查工作中的疏失。

## 二、问题暴露：离卦道事件与妇女调查

因阎锡山政权的村政改造及日伪的战争威胁，位于太行根据地腹心的黎城县未能及时确立革命秩序，各村群众的基本思想动向十分复杂，传统的会道门组织在社会混乱之际笼络了众多处于社会边缘的妇女。离卦道即特别注意吸引妇女，并用无知女人来引诱男人，<sup>7</sup>这进一步妨碍了中共妇女工作的开展。当中共准备取缔离卦道时，各方矛盾陡然升温。1941年10月12日下午，黎城县公安局发现“好多女人陆续往家走，并且都是过去有政治问题的家属”，于是打算在晚饭后开会讨论该问题。<sup>8</sup>是夜，黎城县港东村与北社村间枪声骤起，男女道徒与民

<sup>1</sup> 张玉美（时间不详）：《太行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回忆》，载邢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9）：《邢台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89页。内部资料。

<sup>2</sup>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1997）：《康克清文集》，第8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sup>3</sup> 《展开妇女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工作》（1942年1月20日），《新华日报（华北版）》第4版。

<sup>4</sup> 王照寿（1984）：《北方局妇委在太行》，载武乡县妇运史办公室编（1985）：《武乡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4、15页。内部资料。

<sup>5</sup> 郝秀珍（2021）：《太行革命根据地妇女运动史》，第6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6</sup> 匡亚明（1941年12月13日）：《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新华日报（华北版）》第6版。

<sup>7</sup> 阮章竞（2022）：《阮章竞文存》笔记卷，第11、1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sup>8</sup> 《于一川给孝慈同志的信（关于十月十二日夜港东事件报告）》（时间不详），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89-1-136-4。

兵爆发冲突，并试图冲击县政府。经过激战，无战斗经验的道徒被公安局击溃后逃往潞城县，离卦道暴乱就此潦草结束。

鉴于事态严峻，区党委派遣了一个由三人组成考察团，“以两个月（1941年11月23日-1942年1月26日）的时间进行关于离卦道及群众思想意识与对政策反映的调查”<sup>1</sup>。该调查基本围绕“黎城概况及会门介绍”、“暴动前后各方面的调查和访问”、“社会及政策考察”与“支部介绍”等内容展开。<sup>2</sup>除总结反思保卫工作、整顿党政工作和改善农民负担等材料得到上级党委重视外，该暴动反映出的性别色彩也得到特别注意。

为方便开展调查、厘清事件原委，调查团派专人到各村“找各种类型的女道徒和她生活在一起，用谈话方式了解其心理并进行一般调查”<sup>3</sup>。鉴于妇女问题不宜公开，调查团对妇女的调查和访问基本采取对谈方法，以“谈话-提问-答复-记录”的灵活方式梳理大致线索，入道妇女的真实处境得到了集中呈现。<sup>4</sup>

就考察团的经验总结及其对女道徒的访谈来看，传统迷信、家庭矛盾、个人需要及跟风盲从是其入道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讲，不同年龄阶段和家庭背景的女道徒，对于自身生存状况及中共的妇女政策有着自己的理解。如老年妇女对于政府提倡新婚姻法，表示：“如今这事情都好，要叫老人看起来就不能渐渐如意，因为是老脑筋也就不能提了。不过年轻人觉得好就是好，哪能人人都如意，一人难随百人心，差不离就是了。”年轻女性回答：“如今的妇女比以前好不好”这一问题时，表示“要依咱年轻人说就好，妇女不受压迫，也能到外边跑了，教识字唱歌，比窝在家里好。”在对六名女道徒的入户访谈中，有两名直接表达了对中共相关政策的不满，其中一人“常提起她的合理负担重，出不起，要求给她设法减轻些。说她的苦楚〔处境〕如何艰难，雇工工价太贵，现在不给好好感〔干〕事情，太不好使用等”。<sup>5</sup>

根据调查材料可见，黎城县各村干部对群众状况调查不足，对妇救会等组织重视不够，部分干部甚至滥用权力，负担征收往往沦为摊派。随着干群矛盾不断累积、群众负担日益沉重，生存压力和家庭矛盾很快影响到了妇女。“女性由于社会地位低下，长期受歧视与压制，其精神世界愈显空虚与脆弱，更需要精神寄托与精神支柱。”<sup>6</sup>加之“战争本身的残酷性、破坏性和持久性，令一些落后群众产生了要求安定生活的念头，敌人顺势把不安定归之于劫数，说是在劫难逃，说加入会道门就可以逃避此劫”，日伪也以此吸纳妇女。<sup>7</sup>这直接形成与中共争夺妇女并消解工作实效的不利局面，政治影响恶劣。

与中共对农村妇女的了解不足相比，离卦道利用妇女参加宗教的传统、易被迷信吸引、寻求家庭之外的解脱等特点将其纳入彀中。据统计，离卦道共有3321名道徒，当时黎城县的共产党员仅有1760人。<sup>8</sup>离卦道中，女道徒占比达到47%，

<sup>1</sup> 《黎城考察团调查报告离卦道事件》（1942年4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89-1-136-6。

<sup>2</sup> 《考察黎城离卦道暴动后的报告》（1941年12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89-1-136-5。

<sup>3</sup> 《黎城考察团调查报告离卦道事件》（1942年4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89-1-136-6。

<sup>4</sup>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在调查过程中的关系及其分析，参见方慧荣（1997）：“‘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杨念群编（2001）：《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528-5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5</sup> 《黎城考察团调查报告离卦道事件》（1942年4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89-1-136-6。

<sup>6</sup> 郑永福、吕美颐（2013）：《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第19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

<sup>7</sup> 魏宏运编（200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第5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8</sup> [澳]大卫·古德曼（时间不详）：《1941年的黎城离卦道暴动：抗战、革命与宗教》，载冯崇义编（1998）：《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第17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而同时期黎城县党组织中的女性占比仅为 3.4%。<sup>1</sup>但妇女对离卦道的信仰只是一厢情愿，离卦道对其并无“解放”之意，甚至将其作为性资源吸引男子入道，在溃逃至潞城县的途中还掳掠青年妇女<sup>2</sup>。

对上述情况，中共本该及时调查了解并予以解决，但妇救会的会员和干部多为地富出身，“缺乏劳苦妇女的素质，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习性，下乡工作时骑牲口，打洋伞，穿洋裙，很脱离群众，深为群众反感。工作方法上又简单粗暴”，无法有效推进妇女工作。<sup>3</sup>总之，暴乱的发生既受黎城县党组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没有正确的掌握与运用，……与自以为是作风”影响，<sup>4</sup>也与妇女调查不充分、相关工作落后有关。<sup>5</sup>

根据调查反馈，黎城县党组织在暴乱后开始积极吸收妇女入党，并注意改革婚姻习俗，提高妇女参政率。<sup>6</sup>晋冀豫区党委也吸取离卦道暴动的惨痛教训，决定采取开调查会、派调查团的方式，集中关注根据地农村中的会道门问题。<sup>7</sup>“婚姻（结婚过程、童养媳等，家庭关系，婚礼，离婚原因，性别及舆论）”及“迷信（会道门组织活动，神婆、阴阳人等）”也纳入到调查提纲，<sup>8</sup>妇女调查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

除黎城县外，晋冀豫区妇救总会及各级妇救会亦进行相关调查，但未深入了解社会环境，亦无办法打破迷信。<sup>9</sup>如涉县西辽城有一女巫，“素来拜佛念经，倡导迷信，外人皆称她叫老师婆”，号称“老爷<sup>10</sup>能赶走鬼子”，致使居家烧香的妇女遭敌蹂躏。<sup>11</sup>武北县各救会的领导流于一般化，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许多干部只注重空洞口号与漂亮词句，妇救会也是如此，“很少提土地斗争的问题，而仅强调特殊要求，结果，妇女买卖，并不是强制所能制止的，仍然风行，而妇女连集会的习惯都没有”。<sup>12</sup>某区妇救会缺少实践经验，大部分妇女干部在进行家庭调查时不会接近妇女，甚至看不起落后妇女，广大妇女也不愿接近她们。<sup>13</sup>辽县的支部工作也因妇女参与革命工作会导致名誉不好，加上国民党的破坏，使得“落后势力不允许妇女出门也有了借口”，经调查所得妇女材料亦不完整。<sup>14</sup>

对意图在广大农村铺开革命的中共而言，深入调查了解各阶层妇女的真实状态，熟练掌握动员妇女的策略和技巧，以便争取革命思想在根据地占据主导权是

<sup>1</sup> 中共山西省黎城县委组织部、中共黎城县委党史研究室、黎城县档案局编（1993）：《中国共产党山西省黎城县组织史资料（1937—1987）》，第 56 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2</sup> 《于一川给孝慈同志的信（关于十月十二日夜港东事件报告）》（1941 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89-1-136-4。

<sup>3</sup> 王新泰编（1997）：《黎城妇女运动史》，第 6 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sup>4</sup> 《黎城离卦道暴动及其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1941 年 11 月 15 日），载《党的生活》第 47 期。

<sup>5</sup> 阮章竞（2022）：《阮章竞文存》笔记卷，第 6 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sup>6</sup> [澳]大卫·古德曼（2000）：《革命中的妇女和妇女在革命中——抗日战争中的妇女和中国共产党》，载张国刚编（2001）：《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第 195、196 页，北京：中华书局；[澳]大卫·古德曼（2003）：《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田西如译，第 249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sup>7</sup> 《晋冀豫区党委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指示》（1942 年 3 月 24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1-71-1。

<sup>8</sup> 《某村社会调查提纲》（1942 年 10 月 11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66-2-78-1。

<sup>9</sup> 《一年来妇女工作总结报告——一九四一年八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1942 年 7 月 15 日），载山西省档案馆藏编（2000）：《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 425 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10</sup> “老爷”是晋东南地区的民众对各路神佛的普遍代称。参见孙江（2011）：《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第 4 期，第 5-27 页。

<sup>11</sup> 《四十妇女遭敌强奸 女巫迷信殃及大众》（1942 年 3 月 23 日），载《新华日报（华北版）》第 4 版。

<sup>12</sup> 《武北问题的严重性》（1942 年 4 月），载《刘建勋纪念文集》委员会编（2010）：《刘建勋纪念文集》，第 5 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sup>13</sup>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1942 年 3 月 1 日），载山西省档案馆藏编（2000）：《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 129 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14</sup> 《辽县调查报告》（1942 年 5 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1-72-10。

非常重要的。根据妇女调查材料，区党委认为各县委对妇女工作存在“抓一把”现象，搜集材料全为应付，只注意贯彻生产任务，妇女问题却无人做主。本应负责推进妇女工作的妇救会“老是忽而轰轰烈烈来一阵形式，忽而又没人顾问了，使妇女干部党员做妇女工作没依据、没前途”，导致遭村人排挤的妇女干部想另找出路。<sup>1</sup>

1942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各级妇委“应切实调查研究当地有关妇女运动的一切材料”，并及时总结经验以便指导当地妇女运动。<sup>2</sup>4月，区党委即配合各级妇委，借助春耕动员妇女。在此过程中，区党委发现“现在各县积压的妇女问题非常多，主要是对家庭不满婚姻不满等问题”，于是决定“在春耕中妇救会须要深入婚姻条例教育，大胆的为妇女解决家庭问题与婚姻问题”<sup>3</sup>。5月，中央妇委特地下发调查提纲，以了解各地妇女运动情况和把握妇女运动政策的实施状况。<sup>4</sup>

据《调查研究》<sup>5</sup>刊载的调查材料，自开展妇女运动以来，特别是自晋冀豫边区政府颁布婚姻法以来，根据地的婚姻问题已有很大变化。据榆社县司法科统计，涉案最多的是土地纠纷和婚姻纠纷。<sup>6</sup>根据调查材料，晋冀豫区妇委会提出“贯彻婚姻法令，发动妇女与动员广大群众——对于旧的制度应采取坚决的披露和打击，对新的法令要坚决不动摇的贯彻执行，来打破‘不习惯新制度’的旧意识，工作中多创造实例，使新旧两种制度的优劣对比明确起来”，推进婚姻自主。<sup>7</sup>当时，妇女离婚须委托干部调查，以了解实情。如涉县司法科在接到离婚状告后，便要求当事人所在村的妇救会进行调查。在判决中，涉县政府即援引调查材料确定“被告凭空捏造，无任何凭据”，维护了妇女权益。<sup>8</sup>但由于缺少强力干预和群众监督，侵害妇女的案件仍有发生。如“涉县九区北岗一个公安员强奸了卅个妇女，现扣在县司法科”<sup>9</sup>。

在动员妇女的过程中也可推进妇女调查。如晋冀豫区党委提出，要在斗争中有计划地将参加斗争的妇女组织妇救小组，以便打下妇女工作的基础。<sup>10</sup>积累经验后，北方局妇女委员会号召各级妇委都抽出时间做调查研究，以系统了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状况，并参加当地的妇女活动”<sup>11</sup>为尽可能汇集调查材料，晋冀豫区妇委会将调查提纲分发到各县，为各地委、县委及党团、群团政权提供动员妇女、搜集材料的参考。<sup>12</sup>初步研究各地关于婚姻问题的材料与各方同志的意见

<sup>1</sup> 《妇女问题调查材料》（年份不详，4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14-16。

<sup>2</sup> 《关于根据地各级妇委组织工作条例》（1942年2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199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三，第31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sup>3</sup> 《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动员妇女参加春耕的指示》（1942年4月15日），载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藏（1985）：《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第二辑，第312页。北京：档案出版社。

<sup>4</sup> 《中央妇委令各级进行调查研究工作》（1942年5月），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199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05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sup>5</sup> 中共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组织编印的机关刊物，1942年5月1日创刊，主要刊载各式调查研究材料，其中包括妇女调查。当年7月7日，该调研室全员于扫荡中遇难。此后，因人手不足且稿件缺乏，未能复刊。

<sup>6</sup> 《妇女与婚姻》（1942年5月1日），载中共中央北方局调查研究室：《调查研究》第1期，第45页。

<sup>7</sup> 《晋冀豫区党委妇委会关于婚姻问题研究的材料》（1942年8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4。

<sup>8</sup> 白潮（2011）：《乡村法案：1940年代太行地区政府断案63例》，第32、48页。郑州：大象出版社。

<sup>9</sup> 《妇女问题调查材料》（年份不详，4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14-16。

<sup>10</sup> 《晋冀豫区党委办公室关于黎城群众运动中中妇女工作的经验通报》（1942年12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4-10。

<sup>11</sup> 浦安修（时间不详）：《抗战时期北方局妇女工作回忆》，载山西省武乡县妇女联合会编（1983）：《武乡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一集，第27页。内部资料。

<sup>12</sup> 《晋冀豫区党委妇委会关于婚姻问题研究的材料》（1942年8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后，晋冀豫区妇救联合总会及时了解到各县妇女工作的开展情况。<sup>1</sup>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中共发觉由官方组织的妇女调查虽可履行搜集材料、研究问题的职责，但缺少灵活性，无法及时、充分地向社会各界反映底层妇女的实际需求。如晋冀豫区党委曾“孤立突出的解决妇女特殊问题”，结果招来农民反对。<sup>2</sup>为进一步加强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宣传革命理念，打破迷信思想对根据地建设的阻碍，中共从文艺工作入手，深入乡村进行妇女调查。

### 三、目光向下：文艺创作中的妇女关怀

1942年1月，为纠正根据地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倾向，<sup>3</sup>太行区党委与一二九师政治部召开太行山区文艺界座谈会，号召加强政策宣传和调查研究。<sup>4</sup>会上，邓小平要求“每个文化工作者，要作一个村的调查工作，来丰富作品的内容”，以此接近、了解群众。<sup>5</sup>会后不久，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即在扫荡中全员遇难，有组织的官方调查戛然而止。待局势平稳，中共着手恢复调查研究室建制，并调来了曾有实地调查和创作经验的赵树理等人。<sup>6</sup>

由此，以调查研究为工作方法、以服务群众为创作宗旨的知识分子与党的文艺政策相契合，随之开展了更贴近妇女日常生活的调查活动。依靠灵活的工作方法以及目光向下的创作取向，具备知识分子背景的调查员突破了此前单纯依赖党政组织的单一调查模式，将妇女调查与文艺创作相结合，“取予”有道。

“取”即是下乡搜集妇女生活材料。根据地的材料缺口较大，亟待补充。<sup>7</sup>为此，晋冀豫区党委提倡下级机关结合实际工作进行调查研究。<sup>8</sup>调查研究室外的文艺部门也开始趁便搜集材料。按照区党委“眼睛向下，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实际情形”的要求，太行区文联组织干部建立文联分会，开展宣传教育、破除迷信和初步的地方调查工作。<sup>9</sup>文联干部曾亲身参与黄北坪村的婚礼，并作“赞皇黄北坪村民情风俗的调查”<sup>10</sup>。但因准备不足且不得其法，调查工作最后未有很大成果，本应依据调查材料写出的作品也胎死腹中。<sup>11</sup>为贯彻调查研究、了解社会情况，反映人民意识的现象也被纳入调查范围，“如民间风俗习惯、民歌童谣”，或某人在“婚姻观念、社会观念、生活态度、工作态度上

---

A1-7-4-14。

<sup>1</sup> 《关于“反对买卖婚，争取自主婚”的初步总结》（1942年8月31日），载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1989）：《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第419-42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2</sup> 《如何贯彻中央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决定》（1949年1月），载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1989）：《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第45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3</sup> 赵诺（2023）：《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第325、32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李雪峰（1998）：《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9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sup>4</sup> 杨献珍传编写小组编（1996）：《杨献珍传》，第11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sup>5</sup> 郭素明编（2018年）：《太行革命斗争史》，第25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6</sup> 杨宏伟（2006）：《太行太岳根据地报刊》，第6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sup>7</sup> 《杨尚昆关于阶级变动给锡吾并转李雪峰、安子文的信》（1941年8月1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1-57-4。

<sup>8</sup> 《晋冀豫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工作几个基本经验教训》（1943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1-73-4。

<sup>9</sup> 徐懋庸（1943年3月15日）：《文联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总结及一九四三年的工作计划——在文联扩大的执委会上的报告》，载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1989）：《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第57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10</sup> 《调查口会黄北坪村的婚礼》（1942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第4版。

<sup>11</sup> 徐懋庸（1943年3月15日）：《文联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总结及一九四三年的工作计划——在文联扩大的执委会上的报告》，载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1989）：《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第57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的表现和变化”等，均可加以分析研究。<sup>1</sup>

就调查效果来看，文化工作者普遍对群众“接触得不具体”，“感触也就不深切，结果还是群众照旧干群众的，文化运动干文化运动的”<sup>2</sup>。丁玲在1941年便反对青年搜集材料时的猎奇心理，批评“（他们）记上了很多杀戮、强奸、英雄故事，可以说连脑子都装不下了，于是满载而归。……可是一久，不新鲜了，作家们又去找，写俘虏不动人了，写女俘虏吧，这里还可以有‘桃色’”<sup>3</sup>。可见，妇女调查在具体实践中仍受主观主义限制。

针对这些调查研究中的问题，太行区党委指出“调查材料要找土改村，妇女痛苦较深的村，一般结合典型”<sup>4</sup>。即要在调查前寻找典型，更要在调查后总结材料并塑造典型。落实到文艺创作上，调查者不仅要深入农村搜集材料，还要根据调查材料进行再创作或改编，最后形成革命话语下的文艺作品。该过程展现出“官方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及对地方‘话语权’的控制和争夺”<sup>5</sup>，民间文化的传统道德教化性、等级性和封建性随之得到改造，进而形成充满生活气息的革命文艺作品。于是，中共开始以富有感染力的文艺作品反馈广大乡村，便构成“予”的主要内容，《小二黑结婚》即是代表性作品。<sup>6</sup>

1943年春，赵树理进驻左权县横岭村，以真实故事为蓝本，结合亲身调查，创作了《小二黑结婚》。<sup>7</sup>该小说的创作得益于赵树理在农村进行的调查研究，<sup>8</sup>使妇女的日常生活借由调查和文艺创作受到关注。<sup>9</sup>获悉该小说出版的消息后，时任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的杨献珍将原稿推荐给彭德怀并得到肯定。<sup>10</sup>9月，《小二黑结婚》由新华书店正式出版发行，仅在太行区就销行三、四万册。<sup>11</sup>10月，武乡光明剧团将该小说改编为歌剧，襄垣、武安、涉县、平顺、壶关、阳城、沁源等地的剧团纷纷改编上演，小说主角成为农村青年追求自主婚姻的偶像。<sup>12</sup>传统戏班大都由男性组成，鲜有女性参与。<sup>13</sup>在太行山剧团深入乡间的过程中，民众对参演的女同志感到好奇，于是“有的妇女和剧团的同志渐渐熟悉了，她们什

<sup>1</sup> 《加深调查研究的工作——要了解人民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1943年9月1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第4版。

<sup>2</sup> 王春（1946年6月）：《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载中国作家协会山西省分会编（1987）：《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册），第278、27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sup>3</sup> 丁玲（1941年9月29日）：《材料》，载张炯编（2001）：《丁玲全集》第七集，第5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sup>4</sup> 《兵农合一区妇女工作调查提纲》（1949年1月1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47-1-114-9。

<sup>5</sup> 韩晓莉、行龙（2006）：《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第6期，第90-105页。

<sup>6</sup> “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虽然在1942年5月2号到24号召开，但毛泽东的‘讲话’最早却是在1943年10月19号的《解放日报》上才发表，载入《毛泽东选集》则是1944年5月。而《小二黑结婚》写于1943年5月。所以应该说《小二黑结婚》和《讲话》是不谋而合的。”参见许子东（2021）：《无意之中开启新时代——读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名作欣赏》第8期，第48-51页。

<sup>7</sup> 董均伦（1949）：《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原载《文艺报》第10期。见黄修己编（2010）：《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86-189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sup>8</sup> 陈荒煤（1947年8月10日）：《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载《人民日报》第2版。

<sup>9</sup> 赵树理关注农村和妇女并非偶然，而是与其人生经历关系密切。参见李丹（2021）：《秘密社会与赵树理创作的“古代性”》。《文艺批评》第9期，第85-96页。

<sup>10</sup> 彭德怀于1941年起任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杨献珍于1943年起任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见《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2002）：《中共中央北方局》综合卷，第5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sup>11</sup> 杨献珍（1982）：《〈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新文学史料》第3期，第28-36页。

<sup>12</sup> 姚文锦（2009）：《晋冀鲁豫边区出版史（山西部分）》太行篇，第3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13</sup> 为严格男女之别，清代以后官方多禁止女演员在公开场合演出，导致后来出现的新剧种基本依靠男子扮演女性角色。参见周慧玲（1996）：《女演员、写实主义、“新女性”论述——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剧场中的性别表演》。《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第201页。

么话都说，说生活困难，说婚姻痛苦”<sup>1</sup>。借助脱胎于真实人物的文学角色和贴近日常生活的朴实话语，《小二黑结婚》中关于婚姻自由的故事让群众逐渐熟悉了新婚姻法。<sup>2</sup>

周扬对太行根据地的文艺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文艺界叫了多年的‘文艺下乡’，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sup>3</sup>在这一过程中，赵树理不仅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到中共干部的身份转变，也进一步以地方传统反哺文艺创作。<sup>4</sup>

阮章竞<sup>5</sup>也积极搜集民间文艺材料，并以此为基础“向士兵和农民展开全民抗战的动员工作”<sup>6</sup>。阮章竞曾与其他与农村有隔膜的知识分子一同被调至太行第八分区参与调查工作。<sup>7</sup>正是在此次深入基层的过程中，阮章竞自觉地将调查研究融入到文艺创作中。作为广东人，阮章竞“到山西抗战，居然能用最土最土的山西话，语言十分地道”<sup>8</sup>，还组织太行山剧团做群众文化工作，帮助解放妇女。<sup>9</sup>

调查过程中，阮章竞曾亲眼目睹基层妇女的悲惨经历。如在潞城村遇到过民兵外出乱搞男女关系并对妻子施暴的恶劣事件，即便该村召开了妇女大会，也并未取得实际效果。阮章竞在日记中感慨受压迫妇女无法亦不敢反抗的现实，认为“这不幸的一群，责任在我们如何使她们起来”<sup>10</sup>。相关事件在农村并不鲜见，这促使阮章竞对由落后传统造成的婚姻不幸有了深刻的感性认识。<sup>11</sup>1949年，根据此前在太行根据地的亲身调查，并带着对妇女群体的深切同情，阮章竞创作了《漳河水》。该小说不仅是基于调查研究创作的女性故事，也是革命视角下女性争取独立的解放故事。<sup>12</sup>

中共早期知识分子曾着意于改造社会传统，却屡屡遇挫。如恽代英等人便认为“（青年）回乡以后，最好不要从破除迷信、改良风俗等运动下手，因为这是很多人试验过而都失败了的”<sup>13</sup>。在太行根据地，起自民间的知识分子秉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在重新深入民间的过程中深化了阶级意识，不仅搜集整理了大量文艺素材，更在调查中发现和思考妇女问题，配合调查研究室推进工作，达成了教育群众和改造自身的双重使命。

#### 四、未竟的事业：太行根据地妇女调查的局限

<sup>1</sup> 赵洛方（2001）：《太行风雨：太行山剧团团史》，第28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2</sup> 王荣花（2011）：《〈小二黑结婚〉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婚姻制度》。《名作赏析》第10期，第133-135页。

<sup>3</sup> 华然（1996）：《〈小二黑结婚〉出版的前前后后》。《文史月刊》第5期，第113-119页。

<sup>4</sup> 赵树理堪称是太行根据地中下层调查员的缩影。中共调查员或出身于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却与传统社会关联紧密，或出身于小知识分子，逐步脱离传统并与农村存有隔阂。赵树理恰好兼具此二种身份，并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达成了“新”与“旧”的统一。

<sup>5</sup> 阮章竞（1914—2000），曾用名洪荒、啸秋，广东香山县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阮章竞在太行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并亲身参加土地改革等运动，历任太行山八路军剧团政治指导员、艺术指导员及团长等职务，代表作有《漳河水》《赤叶河》《金色的海螺》等。在太行山区的多年革命生活中，阮章竞特别关注妇女群体，著有多部笔记和文集，后以“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为名统一结集出版。

<sup>6</sup> 阮援朝编（2017）：《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上），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

<sup>7</sup> 赵诺（2023）：《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第45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sup>8</sup> 李零（2023）：《大山中的妇女解放》，《我的天地君亲师》，第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up>9</sup> 阮章竞（2022）：《阮章竞文存》回忆录卷，第48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sup>10</sup> 《赤叶河日记》（1945年6月10日），载阮章竞（2022）：《阮章竞文存》笔记卷，第8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sup>11</sup> 阮章竞（1945年6月8日）：《乡间纪事》，载阮援朝编（2017）：《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上，第158页。北京：中华书局。

<sup>12</sup> 刘卓（2023）：《更宽广的革命叙事光谱——以〈漳河水〉为线索试析延安时期的女性叙事与社会变革》。《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第5-15页。

<sup>13</sup> 惠民、代英（1924）：《农村运动》。《中国青年》第29期。

总体来看,妇女调查一般围绕事先选定的典型村进行,受调查者的文化水平、政治运动以及调查部门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太行根据地的调查活动自1943年后暂时落入低潮,到1944年10月,调查研究室的各项工作才逐渐恢复。<sup>1</sup>抗战胜利后,为加紧恢复国民经济、深入了解阶级变动,太行根据地的调查工作主要围绕“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对妇女调查的人力、物力投入被缩减,所得调查材料也相应减少。<sup>2</sup>1948年前后,太行根据地的社会调查不仅数量偏少,内容也不如先前详细,“除了少量对土改情形的调查外,对妇女的调查较多,但大多数分散在各个调查中,专题调查的数量较少”<sup>3</sup>。襄垣县曾搜集各式报告材料并加以汇集,但其中未包含妇教会材料。<sup>4</sup>为方便各地交流经验,《华北妇女》旬刊曾尝试集中刊登调查材料和妇女政策,但缺少社会各界的反馈,不久便停止专栏更新。<sup>5</sup>具体来讲,妇女调查未能持续助力根据地妇女工作的开展,受到各方因素的影响。

调查员内部存在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妇女干部较少,且受机关工作牵制,调查研究一时间难以深入推进。<sup>6</sup>据黎城县妇委会的材料汇报,妇女干部因婚姻和家庭而难以开展工作,“女干部工作不行”的陈腐观念也影响了妇女调查。<sup>7</sup>虽然采取家庭会议的调查方式,所得材料一般比较接近真相且全面,但在群众(尤其是妇女)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以前,是难以实现的。<sup>8</sup>同时,调查的突击性与权宜性较为突出。受此影响,党群之间缺少持续稳定的双向互动,乡村社会在革命的催化下加快变动,妇女调查尽管揭露出地权纠纷等新问题,却无法给予妥当解决,也就难以直接改善妇女的生活境遇。

据调查材料显示,土地改革后,妇女的经济处境和社会地位有所改善,在生产运动中也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农民在土地改革后纷纷寻觅妇女以解决婚姻问题,导致“各地统治婚姻是相当普遍的、群众性的,这就大大妨碍了妇女的自由,好像是土地改革了,妇女的自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这一问题,现在也未得到解决”<sup>9</sup>。比如妇女地权的归属问题,“各地认识与处理均不一致:有的突出强调带地,造成农村不安,有的为纠正单纯强调妇女经济权的偏向,而只提生产,不敢提妇女(分)一份土地问题;个别地方甚至规定,不分给离婚后尚未改嫁的过独立生活的妇女一份土地等等”<sup>10</sup>。为解决妇女分地的问题,襄垣县要求搜集“如何宣传或执行的?在各种男人中有何反映?在各种年龄与成份的妇女中有何反映?”等材料,以便研究政策。<sup>11</sup>但仅是列出提纲,并未提出解决方案。

<sup>1</sup> 《改进调查研究室工作与相关关系的决议案》(1946年11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1-75-20。

<sup>2</sup> 《太行区党委关于新解放区农村社会经济、阶级关系调查研究问题的通知》(1945年12月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9-8-10。

<sup>3</sup> 马维强、行龙(2009):《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太行根据地社会调查刍论》。《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第93-99页。

<sup>4</sup> 《襄垣县春委会关于一九四一年春耕工作的总结报告》(1941年6月15日),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案号:2-1.1-9-1。

<sup>5</sup> 一丁(2005):《太行根据地文化》,第147-151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sup>6</sup> 杨蕴玉口述、耿化敏采访整理(2019):《我在妇委和妇联工作的几点回忆》,载耿化敏编(2023):《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九辑,第164-17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up>7</sup> 《黎城县妇委会关于妇女工作、干部培养、婚姻调查等问题的汇报》(1948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89-1-36-13。

<sup>8</sup> 《国民经济调查工作点滴经验介绍材料》(时间不详),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71-1-68-1。

<sup>9</sup> 《中共太行区党委土地改革报告(节录)》(1947年6月15日),载河北省档案馆藏(1989年):《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sup>10</sup> 《太行区党委关于处理妇女地权问题的通知》(1947年11月1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9-16-9。

<sup>11</sup> 《襄垣县典型村调查大纲》(1945年),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案号:2-1.1-233-8。

事先制定的调查提纲无法提供完备的参考，实施效果也缺少反馈渠道，这导致程式化的妇女调查常常落后于政策调整。如武安县妇女徐更因抽地与村干部发生龃龉，继而遭受数月刑罚，直到政策调整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方才刊登介绍徐更的案件，并帮助她恢复自由。<sup>1</sup>

潞城县委就妇女地权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据调查材料显示，有的干部认为妇女离婚只求痛快，“以往老农民好容易才得到地，……但今天翻身，女人离婚又带去了他的土地（只承认地权是男农民的），把农民闹的实在没办法”；有的干部较为开明，认为“妇女离婚可以带地，因为他不和牲口一样，从这家牵走。而在他没找到适合的家以前，他还要生活，等到再嫁后不需要地就撇下，需要地就带走”<sup>2</sup>。安阳观台镇的调查材料则直接反映出村委干部对妇女享有地权存有思想障碍，认为“现在仍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如果妇女有了一份土地会变化太大，造成农村混乱，影响生产，光强调宣传共同劳动，共同致富，劳动到那里，那里就有一份。空口允许，实际等于没有”，妇女分地政策始终没有执行。<sup>3</sup>

伊莎白·柯鲁克曾在武安县十里店进行调查访问，发现妇女干部们在土改整党中往往被“各种各样的小事缠住了”。由于未接受专门训练，新发展的妇女干部不善于解决实际困难，最后“只好依靠男人，附和他们，而男人们并不了解妇女们的特殊问题”<sup>4</sup>。潞城县的“妇女们一连多少天都不回家，不久就引起了男人们的抱怨。这种怨声越来越大，妇女们只好答应让步：白天在自己家里干，晚上在‘洋房院’里干”<sup>5</sup>。

长治二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发动妇女不力，缺少正确领导，没有真正发挥妇女群体应有的作用，甚至大部分妇女还存有“严重的怕变天、怕报复的思想，怕八路军再走了”的消极思想。经事后调查，干部却认为这是因为妇女觉悟比男人低、受压迫也不直接，而且心软的妇女容易被感动，难以动员。<sup>6</sup>武乡县泉之头村搜集到的妇女调查材料中也提到村干部不支持离婚、家庭矛盾与妇女无法参与冬学等问题。<sup>7</sup>壶关西庄基点村的贫雇妇女也曾提到“村干叫你给谁结婚才能嫁谁”<sup>8</sup>。

随着新收复城市增多，中共也开始在城市开展调查。<sup>9</sup>因新收复城市曾位于游击区或敌占区，而“游击区环境不甚安定，尤其在敌占优势之游击区，不容有充分时间进行详细调查”<sup>10</sup>，所以调查经验较少，对妇女也不甚关注。<sup>11</sup>随着城市工作的不断推进，旧政权遗留下的妇女问题亟需通过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对此，

<sup>1</sup> 《武安司法科派专人调查了解 徐更的案确有冤屈》（1948年3月26日），载《人民日报》第1版。

<sup>2</sup> 《潞城县委：潞城县关于妇女地权问题的思想调查》（1949年7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14-13。

<sup>3</sup> 《太行五地委妇委会关于安阳观台镇处理妇女地权的经验》（1949年3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14-8。

<sup>4</sup> [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2007）：《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高建译。第259、2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5</sup> [美]韩丁（1980）：《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惊等译，邱应觉校。第24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

<sup>6</sup> 《长治二区信义妇女工作调查资料》（1948年8月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8-2。

<sup>7</sup> 《武乡妇女工作典型调查》（1949年1月2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14-5。

<sup>8</sup> 西庄通讯组：《壶关西庄基点村 贫雇妇女开大会》（1948年3月26日），载《新大众·晋冀鲁豫》第2版。

<sup>9</sup> 《太行第四行署关于发去城市工作调查提纲的通知与城市调查提纲》（1945年8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68-1-11-11。

<sup>10</sup> 《游击区农村支部工作调查提纲》（1942年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18-3。

<sup>11</sup> 《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一九四五年方针的决定》（1945年1月6日），载山西省档案馆编（2000）：《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七卷，第40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行区党委要求各地围绕妇女的职业和婚姻问题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各业妇女的要求与情况，在此基础上“创造典型”。<sup>1</sup>在城市妇女工作的调查提纲中提到，要关注女工与女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思想转变过程，对我们的态度与反映”<sup>2</sup>。祁县的城市调查反映出因男人出外经商以及被“闫（阎）匪抓丁当了兵”的缘故，“妇女当中婚姻混乱现象，对政策不大明确，也不知叫不叫离婚”<sup>3</sup>。此前被阎锡山以“妇工会”等名义组织吸收的妇女也亟待教育。<sup>4</sup>

妇女调查的政策反馈具有滞后性。新解放城市中的侵犯妇女人权、财权、政治权利等案件急待调查解决，<sup>5</sup>但中共的妇女调查工作却表现出懈怠。长治市委长期不重视妇女工作，“无妇女领导机构，更不知妇女工作方针”，对农村妇女存有强迫命令作风，贯彻妇女政策也不及时。长治市委表面上对妇女调查不重视，实际是对“发动妇女、解放妇女与整个革命胜利，以及社会改造的重大关系没有明确认识。”<sup>6</sup>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的妇女调查工作虽然在某些时期不断完善，妇女的实际处境也借其文艺创作得到大众化宣传，但由于缺乏持续稳定的调查组织与态度，以及不能及时解决调查中的问题，逐渐落入低谷，愈发难以发挥其作用。可见，若要实现妇女解放的革命事业，单凭妇女调查是不够的。

## 结语

中共以妇女解放为导向积极推进妇女调查。但解放话语存在尺度，不应先验性地绝对化。<sup>7</sup>“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社会，理论性、思辨性远远强于一般的社会政治理论，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是其突出的思考路径”<sup>8</sup>，这促使中共通过妇女调查获取真实可靠的基层经验，以进一步完善施政纲领和明确工作方向。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共组织推进的妇女调查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一部分，接续了民初的妇女调查，将调查范围扩展至广大农村。中共在太行根据地持续推进妇女调查，不断深入了解妇情并动员妇女。但不能忽略的是，战时背景下，中共政权组织未稳固确立，群众基础亦不牢固。加之太行山区地跨晋、冀、豫三省，风土人情差异颇大，或因力有不逮，或因党群隔阂，基于提纲或指示的基层材料经调查研究室搜集研究后，往往无法及时、准确地反馈给上级党委，更无法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政策。因此该阶段的妇女调查尚不成熟，大多仅将妇女调查当作收集、获取妇女生活状况的工具。

离卦道暴乱后，中共尝试深入农村直接调查妇女群体，但进而发现思想迷信、妇女受压制、处境悲惨等社会难题无法单纯通过妇女调查解决。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全员遇难后，成体系的调查暂时中止。借助文艺工作者，太行区党委从群众性

<sup>1</sup> 《如何贯彻中央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决定》（1949年1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1989）：《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第46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sup>2</sup> 《城市妇女工作调查提纲》（时间不详），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47-1-114-8。

<sup>3</sup> 《祁县城市妇女工作调查报告》（时间不详），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47-1-118-1。

<sup>4</sup> 文闻编（2009）：《晋绥军集团军政秘档》，第173—17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sup>5</sup> 《涉县部分干部群众重男轻女 有些妇女仍受虐待 县政府正积极调查处理》（1949年1月11日），载《人民日报》第2版。

<sup>6</sup> 《长治市委对妇女工作思想观点的检查及今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议》（1949年4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7-14-7。

<sup>7</sup> 贺佳梅（2014）：《“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第113-1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sup>8</sup> 黄道炫（2015）：《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第4-22页。

宣传教育着手，组织调查活动，创作反映妇女日常生活的文艺作品，改造了民间文化，革命主张也借此输入乡村社会。

从农村到城市、从简单提纲到文艺宣传，太行根据地的妇女调查呈现出层层递进、前后相继的历史面向，这既是推进革命的应有之义，也是扎根农村、巩固政权的现实之举。作为妇女调查的最终任务，妇女解放仍需更为系统、彻底且持续的路径，其最终指向也仍是妇女自身。正如阮章竞所强调的：“（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光靠党的领导，民主政府的法令，还是不行的，首先是要妇女自己站立起来，自己解放自己。”<sup>1</sup>

###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华北社会调查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BDJ016）。

### 鸣谢

本文曾得到业师马维强，与胡永恒、乔君、王燕、张华等老师点评指教，并给予宝贵意见。在修改过程中，亦从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中受教良多，在此谨致谢忱！当然，文责自负。

### 作者简介

史灿（1999- ），男，山西泽州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革命根据地史、性别史，在《社会史研究》、《安徽史学》等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

<sup>1</sup> 阮章竞（1982）：《漫忆啾呀学语时——谈谈我怎样学习民歌写〈漳河水〉》。《文艺研究》第2期，第33-96页。